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科技类大学需要平衡两个使命

■本报记者 沈春蕾

在我国，一所稍具规模的高校，教师、员工动辄上千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然而在世界范围内，也不乏一些“小而精”的高校。相比于其他高校，这些学校有着自身的发展道路，更重要的是，在这条道路上，它们走得并不慢。

位于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我们的学校，教职员工不到 200 名，但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学校已成为世界上研究和论文被引用率增长最快的学术机构之一。”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表示，希望不断引进优秀人才，共同探讨如何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科技类大学与地方发展密切相关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一所科技类大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陈繁昌：大学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也是社会机构的一部分。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大学，必然会得到社会的支持。同时，大学也有责任帮助全社会，特别是在当今发生新冠疫情的危急时刻。

至于大学的职能，首先要认识世界、创造知识。为此，我们需要从全球招募最好的研究人员和教职人员。此外，高校还要承担教育下一代的任务，也就是培养学生。从学生到博士，到博士后，再到研究人员，人和知识是大学两个主要的产品。

如今的科技类大学也在承载着双重使命，一是进行研究和教育，二是创新并促进经济的发展，后者既是使命，也是挑战和责任。在这两者之间，没有第一个使命就不会出现第二个使命。而如何在两个使命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此前，您曾担任过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从香港科大到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您对地方新建科技类大学有哪些理解和认知？

陈繁昌：无论是香港科技大学还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其成立的初衷都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比如，在香港科技大学成立的前期，香港认识到自身不能够再依赖于低成本的制造业，而是要吸引并培养高科技和商业人才。在当时，高科技与商业正是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成为了香港科技大学当年吸引我的



陈繁昌

2001 年担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自然科学学院院长，2006 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助理会长，2009 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第三任校长，2018 年出任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

原因之一。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成立的情况与之有些类似。早在 15 年前，沙特领导人便意识到石油资源总有一天会用完，应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未雨绸缪，投资未来的技术和创新，促进可再生能源、旅游等其他产业的发展，让沙特经济走向多样化。这也成为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成立初衷。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香港科大还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其背后代表的都是世界范围内成立科技大学的一股热潮。其产生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类型高校，科技类大学的主要培养目标是优秀的科技人才，而一旦此类人才与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商业发展相结合，既可以成长为创新类科技企业的创造者，也可以凭借自身实力，成为技术的领导者。而这种对商业和科学领域的双重影响，使得科技类大学成为最契合各地政府发展目标的高校类型。事实上，它们也的确在深刻改变着很多地方的发展业态。

找到合适的人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所年轻的大学，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为什么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陈繁昌：我认为一所高校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人。其中，既包括聘用最好的教职员工，也包括招收最好的学生。

以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为例。自成立以来，学校共经历三任校长。其中，首任校长施春风此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第二任校长让·卢·沙梅欧(Jean-Lou Chameau)担任过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我作为第三任校长，此前是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举此事例，仅想说明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有优秀的教授以及管理者，才能够吸引到优秀的学生。要知道，高校中的教授往往拥有强大的关系网络，可以为学生提供很好的学习资源和人脉，而这些是金钱买不到的。

《中国科学报》：在沙特众多高校中，您希望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

陈繁昌：在成立之初，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就已经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全球性大学的定位，我们希望这所年轻的大学有足够的能力吸引到全球各地最优秀的人才，为沙特乃至全世界的创新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目标，目前我们的教职员工来自于全世界 50 多个国家。这样的大学在中东乃至北非地区是不曾出现过的。从这个角度上说，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更像是沙特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项实验、一个试点。

大学更应带来实际影响

《中国科学报》：您提到科技类大学的使命涉及社会、教育与产业等领域，那么在您看来，科技类大学应该如何处理好与社会、教育、产业之间的关系？

陈繁昌：科技应该像文学和音乐一样，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民众只有掌握了科技知识，才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要知道，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当下，如果离开科技，整个社会的运转都会出现问题，更难提进步，此次暴发的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此，科技应该成为各级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未来领导人以及公众所具备的

观点和知识才能够推动社会各行业的发展。与之同样重要的是，科技也有助于变革和改进教育方法。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疫情背景下在线教育的迅速发展。

当前，各行各业都需要利用新技术提高效率和改进产品，而更重要的是，新技术不仅会颠覆现有的行业，还催生出新的行业。因此，有远见的行业领袖应投入研究，开发新技术，以保持竞争力，实现增长。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些教授认为自己是来科技大学作研究的，而研究就意味着要探索未知，但他们往往不知道这些研究可以产生什么用途。这种状况是需要扭转的，毕竟社会期待大学可以带来实际的影响，希望大学可以帮助社会创造工作岗位、在技术上取得突破、给产业界带来改变等。

《中国科学报》：发展至今，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又是如何解决的？

陈繁昌：我想从两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一是全球角度，二是本地角度。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历史非常短，有些人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这是每所新建大学都会面对的困难。对此，我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以打动更多人了解并加入我们。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从本地的角度来看，科技类大学的双重使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切实困难。目前我们在第一个使命——研究和教育方面做得还不错，并且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同行的认可；但在第二个使命——创新和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对经济产生一定影响方面，我们还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更多的时间积累才能够培育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

《中国科学报》：对于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未来的发展前景，您有怎样的展望？

陈繁昌：一方面，我希望学校的科研人员以及他们取得的成就可以得到更多认可，并能给世界带来切实改变；另一方面，我更希望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创业，建立一批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企业。从目前来看，后者是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方面。

为此，我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鼓励所有学生至少有两周的课外体验时间，用以体会创业者的创业精神。我将该项目称为“全民创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打造成为“创新的摇篮”。

横”，对学生的心理压力“不闻不问”，由此上升到违反师风师德的层面，强烈要求学校对导师严肃惩处并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现象下，一些老师不敢对学生在学业上严格要求，以平平安安顺利毕业为原则，处处宽松相待。但“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尽人皆知，没有师傅的严格要求，哪里有徒弟的真本领。一些原本希望通过严格要求帮助学生成长的老教师，因为担心学生心理素质差惹出问题而进退两难。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总之，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想成为一名受世人尊重、被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就要遵守教师的职业道德准则。在此意义上，师风师德不是施加于教师身上的枷锁镣铐，而是笼罩教师四周的光环彩霞，教师职业特有的尊严感也由此而生。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师德”高压线下，教师不必“人人自危”

■陈巍

近年来，教师师风师德问题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原本考查衡量教师学术水平的教师职称评定，也改革了评价标准。比如，去年颁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就明确提到要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职称评审的首要条件。

师风师德包含多方面内容和要求，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师生关系的规范，这也是公众十分关注的内容。近些年，媒体不时曝光个别教师损害学生利益的恶行。仅以 2020 年为例，便接连爆发如河南大学某教师涉嫌性骚扰女学生、天津大学原硕士生举报其导师学术不端等事件。这些事件引起公众极大愤慨，也引发高校教师与学生如何相处的讨论和思考。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道德的问题上，社会对于教师的要求相对于普通人要高得多，是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所致。

一方面，教师的职业有其自身特点。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尊师重道传统，而教师地位尊崇的前提则是师道尊严、为人师表。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为人处世，教师自己要有良好的言行举止，才能教导影响学生。

另一方面，相对学生，教师天然具有地位优势。学生通常社会阅历不深、心智不成熟，教师队伍的极个别害群之马利用这种优势给学生施压达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倘若没有师风师德约束，师生关系将会陷入混乱，甚至危及整个民族的文明传承。因此，师德有亏，即便专业能力再强，也不能胜任教师之职。

正因如此，教育一旦违反师德，其后果相对于普通人要更加严重。从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看，有些教师的行为并未达到触犯法律的程度，类似情况在职场上并不鲜见，但一旦涉事教师被认定违反师德，将终生贴上“德行有亏”的标签，对其教师职业发展是致命打击。这种“一次犯错，一生受挫”的处罚看似严厉，但其实是有其基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原因的。

2016 年起，教育部启动教师职业改革，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部分大学也实施以“非升即走”为核心的长聘制改革。但在推行过程中，“退出”的标准引起很大争议，一些学校采取绩效考核、末位淘汰的做法与教育理念并不相符。然而在师德问题上，却形成了较高的共识，支持对师德违规问题采取“零容忍”强硬态度。相信未来教师因为师德问题被辞退的案例会越来越普遍。

此外，师风师德包含教师学术规范、个人品

有感而发

衣食无忧方能有科学精神？

■计红梅

前不久，在一个以科学精神为主题的论坛上，一个观点引起了不少高校青年教师的共鸣：“研究人员只有在衣食住行等诸多琐事上无后顾之忧，才更有可能释放科学精神。”更有教师直言，“我们不能用爱发电。”

在与与会者看来，当下科学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底线层面，没有踏实做科研的氛围，评审、评估时经常得“打招呼”“走关系”；二是在高层层面，面向科研“无人区”缺乏不计得失、敢于探索的勇气。而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原因是生活压力太大，首先要解决评职称、人才“帽子”等问题。

三年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在谈及学术氛围、体制机制等问题时有过一番感慨。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淡泊名利的优良传统，而现在的舆论导向太过于引导知识分子‘名利双收’了。”他认为，这对于激发知识分子内心的理想与热情有害而无害，甚

至会导致“良币驱逐劣币”的结果。他希望，我国能有更多的科研人员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而不是每天考虑将文章发在哪儿，只为了获得更高一级的人才头衔。

三年过去，破“五唯”已成大势，“唯论文”“唯帽子”“唯奖项”等导致科研成果功利化、纸面化的评价标准正在被动摇和颠覆，但与此同时，急功近利、浮躁浮夸、学术不端等背离科学精神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诚然，对于科学和科学精神，至今也没有一个世人公认的定义。但基于科学自身的发展要求，以及一代代科学家的探索与实践，“求真、求实、敢于质疑”“不计利害追求真理”等特质已成为科学精神公认的内核。即使遭遇科学研究职业化、社会化的现实挑战，这种传承也始终遵循严格的规约，只要背离这个内核，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行之不远。

精神的力量从来都不僵硬冰冷，而是可

以成为人生中更为积极和美好的力量。苏格拉底有句名言：“获得名誉最好的方式是努力成为你渴望成为的样子。”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长达 16 年的约翰·汉尼斯援引此话说：“这才是一名坚守本色的人要葆有的初心——你必须要明确找到你理想中那些美好和真实的品质，然后努力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对于一名想要成为科学家的研究者而言，毫无疑问，科学精神就是他应葆有的初心、坚守的本色。前车之鉴是，不少已然衣食无忧的学术“大咖”却依然涉嫌学术造假。很显然，这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缺乏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与向往。

科学家确非“圣人”，但科学却应当是纯粹和纯粹的，因此，以衣食无忧为科学精神的前提显然是在为自己寻找怯懦的借口。

构建科学精神，从直面问题、不找借口开始。

高教观澜

岁末年初，教育部持续发布多所独立学院转设公示，标志着本轮独立学院转设进程的速度加快，力度持续加强。但即使如此，仍有超过半数的独立学院尚未出现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公示中，遑论教育部转设公示。

2020 年，教育部共发布了 6 次独立学院转设公示，特别是年中《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发布后，共有 67 所独立学院出现在公示名单中。事实上，以 2008 年教育部发布《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为标志，独立学院转设工作至今已开展逾 12 年，但考察历年的转设结果不难看出，转设过程呈现出起步虽早但推进较缓、要求很高但落地较慢的显著特征。从目前趋势来看，教育部“动真格”的严厉措辞，预示着独立学院本轮转设将改变以往“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遇。

上世纪末，独立学院的出现一方面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有效缓解了公办大学教育供给的不足，加速了社会资本和民办教育的扩张；另一方面也为捉襟见肘的母体公立大学注入了一定的资金。正因如此，也埋下了独立学院规范发展的诸多隐患——发展初期对高等教育公平性的破坏、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缠使民办教育发育迟滞、办学治教的不规范对教育教学质量的影响等，进而使独立学院滋生出“假民办”“校中校”“假独立”等诸多的乱象。

尽管独立学院有效缓解了公办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但层出不穷的管理乱象也确实造成了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保证、民办教育发展不足等严重后果。

此外，启动多年的转设工作曲折复杂和进度迟缓，还折射出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的央地矛盾。显然，有效、稳妥地推进独立学院转设进程，必须要解决好隐藏在表象背后的诸多矛盾。

厘清多元主体的复杂利益关系是转设的前提。独立学院甫一创设就被明确了民办属性，即便存在“假民办”的诸多案例，但仍然牵涉了包括母体学校、社会资本、地方政府等内在的多元主体的利益。而当下独立学院转设慢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多年累积造成了利益主体反复变化和利益诉求的此消彼长。“高价分手费”也好，“金字招牌”的使用费也罢，还有大牙交错的人事安排等，使得独立学院自身治理主体“各打算盘”，难以在收益分成或权益划分上取得平衡。

独立学院要顺利转设，首要工作在于厘清不同利益主体的权益诉求，这就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既按市场规则又计长远发展，划清“公”与“民”的权责边界、厘清“母”与“子”的角色、理清“近”与“远”的规划，在维护国有资产的的基础上，母体院校公立属性的人员、资产该退出的坚决退出、该放弃的首先放弃，让复杂的利益关联回归到清晰的产权关系。如此，既能让坚守多年的社会资本“从容退出”，也能为后来者“接盘”打消顾虑，从而为转设创造良好的前期基础。

充分考虑央地各自诉求是推进转设的关键。始于 2008 年的独立学院转设不可谓不早，但在教育部三令五申之下，全国范围内的独立学院转设速度之慢、范围之小，不得不引起人们对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的央地矛盾的重视。事实上，大力兴起的独立学院是自 21 世纪初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后，高等教育资源又一次的重新布局。一些长期缺少高校的地区，特别是地级市因此获得了不可多得的大学资源。随着上世纪末中央与地方两级办学格局的确立，地方特别是一些缺乏中央部委院校资源的地区，对高校的追逐与日俱增。

因此，在独立学院转设的问题上，要基于中央对高校资源布局的宏观调控，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性，兼顾地方对高等教育资源的诉求。立足地方实际，对在地独立学院采取多种转设形式，既要确保不因母体院校的离场而“釜底抽薪”，也要为它们的长远发展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

确保真正独立运转是转设工作的归宿。独立学院即便经历了 20 余年充分的发育扩张，但始终为人诟病的是“假独立”“假民办”。在办学场所、师资、设备等方面与母体院校千丝万缕的关联和利益牵涉，使独立学院一直“跛脚”走路，这也是众多独立学院难以独立发展的根本原因。

推进独立学院转设，自然要对原有民间资本离场、母体院校资源剥离的后果充分考虑，彻底解决制约独立学院“真独立”的各项要素问题。教育主管部门要引导地方政府、母体院校和民间资本构建真正清晰的产权结构，有效构建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的宽松政策环境，在确保资本办学总体公益属性的基础上，为民间资本投入高等教育解除后顾之忧，从而为独立学院顺利转设、长远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独立发展真正的含义还在于确保转设后人才培养质量不降档次、不低标准，维护受教育者的权益。

走过 20 余年的独立学院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作为中国特色大学体系道路探索的历史产物，不久的将来，这种办学模式虽将终结，但落幕的只是独立学院的名称，永不落幕的则是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独立学院转设要解决『真独立』问题

■马星宇